家乡的土米酒

□邓宗良





老家的镇子，如今比以前的县城还风光。街道的行车线在雨天里尤其醒目，高楼大厦有模有样，一层的底商挂着在大城市里常常看到的熟悉品牌。那天，午后阳光带着倾斜的角度，投射在许多窗玻璃上，闪烁的光斑打在行人脸上。车站那里，原先是镇里唯一大街的入口，不知哪天改造的，现在已接通另一条也很热闹的大街。一时不知走哪一边。记得老大街以前有个供销社门市部，前几年改成饭馆，周围聚起一些大排档。镇子变化得令人有些陌生，但土米酒的醇香好熟悉。闻着酒香，就仿佛回到了家里。

雷州半岛把“太阳落山”，说成“日头落水”。除夕那天，日头一落水，外边忽然没了走动声，家家户户吃起了团圆饭。不时响起的爆竹声，点缀着宁静和温馨。千里迢迢从北京带回的二锅头，父亲咂了一口，又是点头，又是摇头，外人肯定看不懂这表情。他欠了欠身子，伸手从脚边摸出一樽打来的散装土米酒。雷州话里保留了中原移民的一些古语，把“酒瓶”说成“酒樽”就是一例。

这酒樽早就搁在他的凳脚边。他说：“我还是喝我的土米酒。”这句话让人鼻子有些发酸。父亲平时喝土米酒，一个人孤寂地喝。他习惯了。父亲好像意识到什么，补充了一句，说：“这土米酒你们喝不惯，你们喝你们的好酒。一大桌的虾蟹呢，都是下酒的好菜。”我们早就跟他说过，这土米酒，没什么新工艺，里面这个醇呀那个醇呀什么的，没有分离出来，要把身体喝坏的。老了变小变瘦的父亲呵呵一笑，说：“你们年年说喝土米酒会怎么样怎么样，瞧我结结实实的。雷州人祖祖辈辈喝土米酒，不会有事的。”大家跟着笑，笑他既固执，又可爱。

父亲把土米酒倒在大瓷碗里，一脸的满足。他说：“过年不喝几口土米酒，不像过年。”他怕我们扫兴，又唠叨了几句，“这土米酒用雷州好米酿的，没什么度数，它就是个米……”我们知道他的意思，替他说：“它就是个米饮料。”他很少笑出声来，这次他笑声朗朗，脸上新老皱纹层层叠叠的。

土米酒在大瓷碗里轻轻地晃动。土米酒没有被好好地滤过，看上去像搁了几天的米汤，有些浑浊。一盏浊酒，那是文人的话。土米酒的浊，透着纯朴，透着亲情。

坐在矮椅上的母亲，漾着笑容的脸，像是从低处探出来的。她背驼得厉害，眯缝着眼，听着我们说的每一句话。她说她真的老了，眼睛里总是孩子们小的时候。那些年，米不够吃，哪来的好米酿酒？她挪了一下身子，好像要干什么。父亲把一个大瓷碗晃晃悠悠地推到她面前，给她倒上了半碗土米酒。母亲的目光没离开这半碗酒。父亲给她倒满了。母亲平时不沾酒，但她能喝，喝土米酒差不多像喝水。雷州人都能喝土米酒。

我们给父亲倒满一碗土米酒，也给自己倒满。大家不怎么吭声，心思似乎都沉到土米酒里。

这些年，在外面吃饭，大家不知不觉就会说到减肥。这顿年饭格外小心，躲着这个话题。母亲说过，减什么肥，吃饱饭还没多久。她打开电饭锅，说：“好香，多吃几口，吃饱了。”她说，今年台风没有打伏稻子。

父亲嫌她话多，说：“喝酒吧。”

这个夜晚，从半敞开的门边吹进的海风，像喝过土米酒，摇摇晃晃的，一副微醺的样子。

土法酿米酒，是雷州的老传统。土米酒喝上几口，感觉真的不一样。米酒哪儿都有，一样，又不一样。冬天的夜晚，家乡的土米酒落到肚子里，是一团火，暖暖和和的。越长时间不喝土米酒，土米酒的味道就越熟稔、越厚重。

镇子酿酒的稻米，是海边水田种的。那水田肥沃，泥土又黑又黏，踩在上面拔不出脚来。酿酒的水，是井底沙砾层滤出的甘泉。还有很多的不一样：雷州半岛那些耀眼的阳光，那些捧得起来的星光，那些吹起来几天几夜歇不下来的海洋季风……酿酒的人，是左邻右舍。他们把纯真和坦诚，酿进了土米酒。

小时候，镇子新街西边的人都种地。种了早稻，又种晚稻。冬季里还要种番薯。种地人的脸庞，黑里发红，红里发亮，一年四季的日头晒出来的。脸上的汗珠结实，饱满，沉重，也闪着亮晶晶的红。

家乡人喝得出土米酒里的味道。

插完秧，或者割完稻，回到家里大半夜了，人们还要喝几口土米酒，说是要解解乏。逢年，过节，嫁娶，生儿育女，上学，入伍，几口土米酒最能分享喜悦，好像它才是主角。料理完老人的后事，也要喝一碗土米酒，默默地喝着，不时摇摇头，叹息一声。碗里的酒没喝完，眼前就朦朦胧胧、迷迷糊糊的，好像是他们离开了亲人，走远了。

碰到难题，不顺心时，也会三三两两凑到一起喝几口土米酒。喝着喝着，便有了主意，便想开了。难免有吵闹的时候。镇子是个熟人社会，陈芝麻烂谷子是不能提的。年长的人最后说：“喝也喝了，乐也乐了，哭也哭了，闹也闹了，都回家睡觉去。”那时家里还没有电灯。喝土米酒的人，借着路灯的光亮，在巷尾的树下蹲成一圈。夜深时路灯灭了，才发现这个夜晚有月光。

下雨天，屋檐下，雨点滴滴答答的。不能下地干活，一家人便随意坐在屋里，抿几口土米酒，说着家里家外的大事小事。日子慢慢悠悠的。

喝土米酒也不是没耽误过正事。镇子里一天没几班客车，喝多了，走不了。恢复高考时，有人说紧张，喝两口，迷糊了一会儿，被酒嗝儿打醒，已错过钟点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即便平常的日子里，大家也能喝上土米酒了。

我们几个半大的孩子，没当真喝过几口土米酒。舅舅追着人家叫嚷，要跟人家喝个够。他要吓唬人家。舅舅酒量大，脾气不小。他常常喝醉，却看不起喝酒的人。他的一个伙伴去了城里工作，他拿这个说事，说：“瞧瞧人家，不喝酒，有出息。”

没人附和他这话，说他喝多了。

舅舅说：“喝酒谁不会？扔进米酒缸里，拎出来就是个酒小子。”他给姐姐妹妹的孩子说这些话时，眼睛瞪得老大，像一对牛眼，不容辩驳。从喜欢喝土米酒的镇子出来，那时的我却不会喝酒，像是装出来的，其实完全就是舅舅“教育”的成果。中小学的老同学现在还跟我说：“有个亲舅舅，也好，也不好。”大家哈哈地笑开了。

回到镇子里，最开心的，是一大家子人又能挤在桌子边吃顿饭。舅舅喝土米酒，还是一大口一大口的，让人开心，又让人揪心。他仍是从前的那个样子，说话不绕弯。他跟我说：“这酒啊，过去不喝，现在就别再喝了，舅舅再替你喝一次。”他一口把我碗里的酒喝了。一晃舅舅七十多了，已是一张老脸。他的酒量衰减得厉害，喝酒的架势却一点没变。母亲装着个样子，摇晃着酒坛子，说：“没酒啦。”

想起小时候，供销社门市部里摆着大酒缸，装满土米酒。绑着红棉布的酒缸盖，潮乎乎的，又厚又沉，把酒缸盖得严严实实。竹筒削成的几个容量不同的酒勺，长短不一，在酒缸旁挂满一排。孩子们拎着酒樽去打酒，眼睛盯着酒勺咕咚一声沉到酒缸里。酒勺被直直地提了起来，稀稀拉拉地滴着酒。土米酒倒进漏斗，落入酒樽。有时售货员说：“还有几分钱，别添那几滴酒了，拿两块糖吧。”小孩子舔舔嘴唇，点点头。一块糖果含在嘴里，撑圆半边腮帮子，回到家时还没变小。

父亲85岁那年，手指间的烟卷一扔，戒了烟。可就是戒不了土米酒——是他自己心里多有不舍。母亲说：“这把岁数还能活几天？随他吧。”镇子以前属遂溪县。遂溪是个有名的长寿县，百岁老人很多。这不是说喝了那些米饮料般的土米酒就能长寿。他们长寿的秘诀，是勤劳、豁达、坚韧、勇敢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我们镇子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下面有好几个村子挂着革命老区村的牌匾。一茬一茬的孩子说起这事，鼻子尖闪闪发亮，好像都是他们家的故事。

父亲早年间土米酒喝不上，没喝够。这事不能老想着。老想着，我便觉得亏欠他的更多。给他上坟时，不会忘记给他抱上一樽满满的土米酒。土米酒倒入大瓷碗里。大瓷碗慢慢地倾斜着，土米酒像条细线，断断续续地飘落，湿润了他的坟头。

浑浊的土米酒。甘醇的土米酒。

土米酒给了父亲那一代人饥饿感，又给了他们饱足感。给他们的，还有很多。

父亲说过，雷州东洋海积平原里他的那个村子，围堤外有一片开阔的海滩，日本鬼子进攻雷州城时曾在那里登陆。这个村子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据点。他那时还很小，几个孩子天没亮便跟着大人赶海。漆黑漆黑的海面跑着一排又一排的白浪，身后灯火熄灭的村落忽然间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响。孩子们不怕，他们好像偷偷喝过土米酒，浑身热乎乎的。

土米酒早早地给他们打上了老雷州的烙印。

穿过台风

□杨兴球

我铺开海图，顺着超强台风“威马逊”登陆湛江后的走势画出一条线。那条线贴着北部湾海岸，正朝北海压来。

我愣了一下，握住方向盘的手微微发抖。铅笔从指间滑落，滚了几圈，停在海图标出的北海位置。走出驾驶室，站在太阳晒得发烫的甲板上，望向远方的大海。台风就是从那个方向来的，自家的船恐怕顶不住。

船是置家人的全部家当。船在，家就在；船没了，家就散了。

我摸了摸刚刚刷完油漆的船板，脚踩上去还有轻微黏性。新买的没有沾过水的青色渔网，白色缆索静静堆在一旁。桅顶上那面旗子，一会儿朝东飘，一会儿朝南飘，啪啪地响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只鸟立在船头，静静地望着我。以前出海，常有鸟飞落船上。我想它们或是迷路了，或是飞累了，常常给它们拿点吃的。但我现在顾不上它了。

傍晚，风突然消失，周遭死一样沉静。紧接着，北边涌起一团黑云，黑云透出淡淡的红光。黑云迅速扩散形成一张黑幕压下来。顷刻间，天昏地暗。风呜呜地吹，像有人在天上吹螺号，一声比一声长。风雨一阵紧过一阵，横扫过来。

船陷在风浪里，打转，沉浮。浪把船托起，抛下；再托起，再抛下，炸出浪花飞上船面。船身摇摆倾斜，船边几乎接近水面，发出撕裂般的“吱吱”声。我穿上救生衣，从船头爬到船尾。用旧轮胎绑在船边，把稳舵，转移船位，避开碰撞，抛下船头、船尾两只大铁锚，把船死死拉紧。

四周的船，像漂在海面的树叶，挨着，碰着。不远处，一条渔船进水了，船尾慢慢沉下，船头翘起，瞬间两排浪盖过来，船没了。随后，木板、油桶、衣物浮出水面，随风浪漂。一股柴油味冲进鼻腔。

我忙到深夜，翻开潮汐簿对照计算。水退了，浪也小了许多。心才稍稍定下来。我蜷缩在驾驶室里，身体有点麻木。望着天边，天是黑的，海更黑。分不清哪是天，哪是海。嘴里含有盐味。我想起家里。

手机没有信号，联系不上。风这么大，家里租的那间瓦房撑得住吗？母子俩现在怎样？想回家。看一眼指南针，风从西南方向吹来，慢慢转向南方。台风回南前，大约有半小时的停风，我必须抓住这半小时，上岸。

爬上码头，我头有点晕，脚站不稳，心口起伏。回望大海，船已被黑夜掩盖，只见白浪滔滔。风雨再次扑来。我踏着积水跑起来，冲出南满码头，上北海大道，朝家的方向奔去。

抬头看，风雨交织，像一层薄纱从天空垂下来，一幕幕漂移着。我像在纱中穿行，融进风雨里。压得很低的乌云，从头顶狂奔而过，仿佛人只要纵身一伸手，就能触摸到。

从公路路口拐进一片桉树林。穿过这片树木，就是大墩海渔村，家就在这里。狂风把树枝压低，又拉起。树梢扫到地面，带出水花泼向空中，划出一道弧，又落到地面。我边走边躲，加快脚步走出树林。

到了家门口，一根木棒顶住门。我一只手抓住门，另一只手抽出木棒。门猛地被狂风掀开。我喊：“四妹，四妹！”妻子朝我大喊：“不要进来，危险。”屋内积水没过脚面，屋瓦摇摇欲坠。我冲进屋，抓棉被顶在头上，对妻儿大喊：“不要怕，我们到对面的楼房去，那里安全。”

安顿好妻儿，我的心才稳下来。但台风依然不要命地刮着。我问妻子：“隔壁有人吗？”妻子说：“不清楚，可能有吧。”

我想隔壁若真的有人在，真的出什么意外，我这一生都不能安宁。我打开门又冲出去，回到狂风暴雨中。我用手机照明，一家家看，大声喊“屋里有没有人”，边喊边拍门，果然看到一家有四口人被困住，屋内也已积水。暗夜中，他们的眼睛亮得发颤，透出惊恐和无奈。我赶忙打开另一间毛坯房让他们进去。他们跟着我，边走边问：“老杨，那边安全吗？”我说：“你们跟着我就行。”他们是湖南人。丈夫靠潜水挖螺谋生，说曾跟我出过海。我笑了笑说：“记不清了。”

做完这一切，回到屋里，我躺在铁架空床上，手脚酸软，只能闭目养神。儿子望向窗外，兴奋地说：“爸爸，你来看，天上有很多东西在飞。”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一只鸟从窗前掠过。

屋内，妻子点亮蜡烛。微光照出她瘦弱的背影。风从门窗缝隙吹进来。烛火左右摆动，一闪一暗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她的眼睛还是亮晶晶的。光和暗影围住我们一家。

台风过后的第二天，我回到码头。船还在。船边几块板裂了，船底渗了水。我站在甲板上，风已转为东风。桅顶那面旗子仍迎着风在飘着。船轻轻晃了一下——是浪在动，不是风。

码头人多了，远处堂叔喊我的名字，问：“船怎么样了？”

阳光又猛了起来，照在脸上，有点辣。我眯起眼看了看海。海是平的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我爷爷的船，我父亲的船，我的船，都是从这片海来的。

不远处，一群鸟从岸上飞向大海，排得整整齐齐。我想起台风前落在船头的那只鸟。它现在，正飞向何处？



爬满牵牛花的墙

□谢　华





老家的院子是我童年所知的完整宇宙。它不是很大，却被母亲整理成井然有序的样子：墙边有凤仙花一丛，台阶旁种几棵鸡冠花，晾衣绳上挂着苦瓜。而最显眼的，是沿着东墙攀缘的那架牵牛花。到了清明之后，母亲照例从布袋中取出一些黑亮的种子，用小铲把墙根处弄出若干小孔，每孔埋进两三粒种子，再盖上薄土。“牵牛这花啊，最是认家，你今年种了，明年它自己就知道从哪儿冒出来。”她提着喷壶，一边浇水，一边说着。

等到五六月份时，墙根底下已出现大量嫩绿小芽。两片圆叶恰似小孩并起的、未张开的手掌。这类植物遇风即生。一夜间，那些细藤以螺旋状向上摸索，可以攀附任何物体。不到半个月，心形的、有绒毛的叶子像碧绿的瀑布一样将墙壁盖满。晨露聚在叶子上，亮晶晶地发着光，像一串串小钻石。

其实，它的奇迹是由每个黎明带来的。

记忆里，我还在睡梦中便被母亲叫醒。我一边揉着惺忪的眼睛，一边趿上鞋，同她一起到院里看整面墙上的牵牛花。蓝、紫、粉或白的花朵，都像小喇叭那样，朝上空吹着没有声音的乐章。新绽开的花朵，花瓣极薄，边沿微皱，正借晨光熠熠生辉。

母亲说宋朝有个叫秦少游的，写过一首有关牵牛花的诗：“银汉初移漏欲残，步虚人倚玉阑干。仙衣染得天边碧”，多美啊，那蓝紫的花朵怎么不是天上扯下的云霞呢？后来才知秦观所作的《牵牛花》是写七夕的。牵牛花一开正好是牛郎、织女重逢的季节。古人认为牵牛星与牵牛花之间有联系，这究竟是谁先提出的，想来已难考辨，但这样的说法一直缠绕着流传下来。母亲的文化虽不高，但喜爱读书，记得不少古诗词。她所记的句子同牵牛花的种子一般，在心里藏了若干年，又在不同的清晨以花的形式交给我。

我时常在夏天用小竹管去吸花心里的蜜，味道很甜。但最让我喜爱的还是观察花苞的展开。若你一直注意着它，好像没有变化。稍有走神，它已开始张口，紫边略带卷曲地露出一点点。再眨一下眼，整只喇叭便完全张开，所见花瓣尚有折痕，恰似新拆的信笺一般轻柔。

母亲说牵牛花是有灵性的。“你看它缠藤的样子，左缠右绕，像在寻人。日本那边，管它叫‘朝颜’。说是早晨的容颜，太阳一出来就老了。他们写和歌的，最爱拿这个说事。”对于和歌我并不了解，只因“朝颜”而喜欢那个名字——原来看似美妙的花，只许开到清晨为止。若在正午观察牵牛花，花是蜷起的、皱着的，原是艳蓝或紫红的色相，忽然变成微弱的红。个别花瓣掉在地上，只是一层薄物，拾起细看，其脉络恰似蝉所蜕之衣。母亲说：“这花啊，每一个早晨都在死，但每一个早晨又都在生。”

对于母亲所说的话，我那时只是一知半解。不过她有个固定习惯：每日清晨要采来最新鲜的牵牛花，别在鬓上。我曾问她缘由，她便笑答：“好看呗。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再少年。趁它还开着，我也还看得见，就戴着。”

若干年后，我查资料才知牵牛花曾被当作药材，种子名为“牵牛子”，亦可叫“黑白二丑”——按种子来分有黑白二色。这名字真有趣，好好的花，偏叫个“丑”名。不过随即想到母亲的话：花本来不美也不丑，那是人的命名所定。牵牛花自己对名字似乎不很在意，它只按每天的晨光来绽开，吹起无声的喇叭。

牵牛花每年都在约定的季节开花，而且越来越繁盛。有一年春天，母亲来不及种——她的手已不听使唤，不能握小铲子。可夏天一来，墙边仍有大批牵牛花嫩芽破土而出。“你看，我就说它认家吧。”母亲站在那儿，开口笑道。牵牛花自己会繁殖、会生长，现在已把院子当作世代栖居的地方。

母亲患病的那一年秋季，院墙上的牵牛花正开得旺盛，一丛丛地挤着，好像用尽了全部的力量。我挑一朵最蓝的花，拿去放在她的枕上，她那时的神色显得异常平静。办完母亲的后事之后，我又回到母亲住过的宅院，去收牵牛花的种子。那些种子散在地面，我把它们一一拾起，又记起母亲曾告诉我牵牛花自种下到开花一般只需100天光景。它生命并不长，但它所结的种子不急于表现自己——来年、隔年都可发芽，只要环境允许，就能开出花朵。

我把种子装在小布袋里带到江南来。因为没有院子，只能在花盆里把种子埋下。第一年所种的牵牛花只开了零星几朵，又小又不艳丽。第二年换用较大的花盆，花藤就缠住晾衣架往上爬。早晨一打开阳台的门，总有新绽的牵牛花像吹喇叭似的在叫唤。

有一天，朋友到我家做客，见阳台上的牵牛花便说：“这么普通的花，你种它干吗？”我没作答。他不晓得这“普通的花”原是经过一整个夏天长成的，是母亲鬓边戴过的花、是清晨所读的种种词句。

去年夏天，我再次回到故乡的老宅。老房子现在空着，庭院中只生荒草，已没了秩序。东边的院墙还在，所爬的牵牛花也未消失，而且比以前更多。藤缠藤、叶叠叶，花谢又开，整片地仿佛是蓝紫二色的海。我挨着墙根坐下来。晨光把小喇叭状的花照得极清楚，花瓣薄如蝉翼，有微细的纹路可辨。露水还凝在上面，一粒粒的，像是从前母亲洒过的水。

我把一朵牵牛花摘下来，放到手心里。花极轻，没有多大分量，蓝紫的花瓣仍留有清晨的凉气。这时忽然又想起了母亲。母亲生平清苦，没有多少积蓄或财物，却把一整面墙的牵牛花以及那些诗句留给了我。

临走之前，我又装了一袋牵牛花的新种子。火车从故乡驶回江南，车窗外是接连不断的田野、村庄。我靠住窗，把小布袋握在手中，慢慢睡去。梦中又见母亲坐在花架下，做着她的活计。那些颜色不一的牵牛花恰似好多小喇叭，向天吹奏只有我俩能听见的乐声。